

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韩 震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华侨的生存状态, 从而对他们的生存身份产生了新的影响, 对他们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带来新的特点。过去, 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一般是为了避难, 如躲避战乱或灾荒, 逃避政治迫害; 现在, 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往往是因为正常的经济交流、贸易活动和技术移民。过去, 许多国家要求华侨华人完全接受居住国的文化; 现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侨民的多元文化性质。过去, 华侨华人不是落地生根, 就是盼望落叶归根; 现在, 他们却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游弋, 成为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天然纽带。过去, 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感情更多地是基于祖国的积贫积弱而盼望中华民族的复兴; 现在, 对祖国的感情更多来自对祖国蒸蒸日上、繁荣发展的自豪感。

关键词: 华侨华人; 全球化;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G 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X(2009)01-0025-08

凡有人类的地方, 就有华人的足迹。可以说, 华侨华人遍及天涯海角。目前, 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约 3 500 ~ 4 000 万人, 他们散居在全球不同的地方, 把他们联系起来的, 就是中国人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即使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华裔, 生活习惯与国内的同胞有很大差异, 语言交流也出现障碍, 但他们仍然有族群认同的潜意识。例如, 尊重家庭价值、崇敬祖先、重视子女教育、倡导和谐宽容, 等等。

我在另外一篇研究华侨华人文化认同问题的文章中已经说过, 越是在文化有差异、处于流变过程以及发生断裂的地方, 就越是会出现文化认同意识的自觉。由于华侨和海外华人的特殊生存境遇, 在他们身上的文化认同就更容易成为一个问题。“文化认同是寻求某种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 但由于它缘起于文化的差异、流变和断裂, 因而其进程、形态和内容都是复杂而多重的。文化

认同是一种建立在分化、差异(甚至对立)基础上的选择过程, 因此这种认同并不是对单纯的或只有单一色调的形象的叙述, 而是对复杂的或各种颜色相互浸染的图景的叙述。^[1]与生活在国内的同胞相比, 华侨和海外华人恰恰身处文化差异和文化交融的环境, 他们经历急剧的文化流变进程, 直面文化的断层和交叠, 因而对自己的生存身份和文化认同就更加敏感。

在本文, 我主要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华侨的生存状态, 从而对他们的生存身份产生了新的影响, 对他们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特点。

德国学者约恩·吕森指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不同传统与文明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文化交流中日益增长的密切联系对历史思想构成挑战。而正是在历史中, 人们才得以阐述、表达和讨论他们的认同, 他们之间的归属感和

收稿日期 2008-09-08

基金项目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课题(GQBY2007021)

作者简介 韩 震(1958-), 男, 山东聊城人,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

共性,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全球化进程使传统的历史认同直面飞速变化的生活环境,要在不同民族的生活领域之间做出传统的区分已变得十分困难。文化生活中的混合现象与普遍化因素,正如互联网和某些重要的文化产业部门所表现的那样,需要我们重新界定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自我与身处其他文化的他者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了自己的身份。^[2]显然,按照吕森的说法,全球化进程推进或加深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的危机,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意识。我同意这一基本判断。

尽管全球化进程自所谓发现新大陆以来就开始了,可是,这个进程在最近20年明显加速,并且成为人们竞相讨论的课题。在冷战结束之后,借助通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和全球贸易,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曾经指出:“全球化可定义为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网络。全球化不是新现象,也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市场扩大并将人们联结起来,环境、军事、社会和政治相互依赖都有所增强。”^[3]然而,除了经济、政治、军事和环境之外,全球化还使各种民族文化相遇,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全球化使人们的时空感和文化认同及归属感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陈有志在《鹅湖月刊》发表了“‘全球化’——作为一个现状发展的理论反省”一文,指出:“全球化是一种集中市场生产下的空间决定,所扩及我们的知觉关系,产生一层新经验的给予。”这种新经验往往表现为多重的身份体验,使原来相对单一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产生动摇。“全球化知觉已隐占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及微支配的伦理问题。另在,现代国家权力,除了来自内部产生竞争力的扩大外,更需致力全球离散社群的脱序规范。交织在多重意识及身份认同,由离散及交叉外部全球性关系的合理化,更会更多的挪用单一化地球全貌(panopticism)流动,作为合法权力的法理基础。”显然,如果说国家权力的行使不能不考虑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那么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特别是作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其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感必然也会感受带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首先,全球化进程使各国相互之间的移民越

来越多,这使华人侨居或移民国外的目的发生了变化。过去,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一般是为了避难,如躲避战乱或灾荒,逃避政治迫害,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现在,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往往是因为正常的经济交流、贸易活动和技术移民,等等。因此,由于进入科技和主流商务,与以往相比,华侨华人文化认同更多的不是乡愁,而是四海建功立业的自豪感。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口在国际之间的流动和移民越来越多,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大量移民。2007年7月17日,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彼得·邝在《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发表题为《中国移民走向全球》的文章,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有1800万中国人出国。”在散居海外的近3500万华人中,这些人所占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显然,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也加快了。

移民增多的动力当然是经济和贸易,并且促进了居住国的繁荣发展。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埃文斯认识到:“像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其国家的实力依赖于几十年来源源不断的移民的增加。”^[4]另一方面,华侨华人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华侨华人出国的原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人们用“拓荒史、逃难史、苦力史、血泪史、革命史”形容华人移民的历程。可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总体说来,新一代中国移民受过良好教育、精通科技、为自己的根在中国而自豪。新一代华人移民教育程度高,创业能力强,且自觉融入主流社会,与过去相比华人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有抱负。

在西方国家,华人数量最大的是在美国。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华人总数为2422970人,为全美总人口的0.9%。在华人中,女性比例为51.8%,人数为1255905,男性比例为48.2%,人数为1167065。在美国,完成大学本科教育的25岁以上的华人男性有23%,女性25%,而全美平均值是16%和15%;完成硕士教育的,华人男性占17%,女性13%,远远高于全美平均的6%和6%,也高于亚裔平均的13%和9%;完成博士学位的,全美平均为男性1%,亚裔平均男性为4%,女性1%,而华人男性8%,女性3%。全美完成大学以上学位的男性为26%,女性

23% ,亚裔男性 48% ,女性 40% ,而华人男性为 53% ,女性 44%。正因为这种高层次的教育水平 ,使成千上万的华人进入主流就业市场 ,担任管理人员、专家、学者 ,从事计算机、财务有关的技术性工作。他们得到的是优越的生活条件 ,失去的则是熟悉的文化 ,疏离的则是亲情 ,缺少的是归属感。但是 ,中国文化仍然在他们身上起作用 ,文化的基因仍然在华侨华人日常生活中传递。例如 ,在美国 ,大约 84% 的华人家庭是传统意义上的双亲婚姻家庭。这一比例比全美的平均比例 (76.7%)高出了将近 10 个百分点。在此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价值的因素。在谈到华人女性时 ,人们认为 :“作为母亲 ,又是承前启后的第一代移民 ,她们在中美两种文化与观念的碰撞和挣扎中 ,以极大的爱心和智慧孕育出了兼具中美文化传统的华人下一代。可以预见的是 ,在这种世代的接力中 ,将大大促进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交流和发展。”^[6]华人日益提升的教育水平使他们在经济、科技和教育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在美国的著名高校中 ,自然科学系科的主任有 1/3 为华人。华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 ,如骆家辉担任华盛顿州的州长 ,担任中小城市市长的华人有 50 人左右 (美国 3 万人以上的城市约有 1 000 个)。^[6]

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 2007 年 12 月 6 日报道 ,目前大约有 8 万多中国学生正在日本各大学上学 ,占日本外国留学生总数的 2/3。毕业后 ,他们进入日本劳动大军 ,挤进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热门行业。中国白领工人大量涌入 ,迫使日本重新考虑其民族特性。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的大量涌入 ,迫使日本重新审视其对外国人的态度。日本《中文导报》2007 年 8 月 3 日报道 :东京都外国人登录总数 381 671 人 ,占东京都人口比例的 2.99% ;其中中国人最多 ,达 130 023 人 ,创历史最高记录 ,这意味着每 100 位东京都民中就有 1 名中国人。出现了许多中国人自办的学习塾 ,如中文塾、音乐塾、钢琴塾等 ,还有谈话室 ,网吧有 30 多家 ,书店 20 余家 ,中文报纸 10 余家 ,3 家中文电视台开播 5 个频道。

传统认为 ,到欧洲的华人多以开餐馆、跑单帮为主 ,但今天一些华人或因经营贸易而顺势开发自己的品牌 ,更有在信息科技业中展现专长。华人过去多在大城市集中居住 ,现在也更加自信地

分散到中小城市 ,其活动范围从中心点、大城市辐射至邻国、城郊、小城与乡镇。根据中新社报道 ,中国驻英大使傅莹称 ,旅英的中国学者是非常杰出的 ,现在有一百多位中国教授活跃在英国学术界和科研界 ,其中有一人被聘为皇家学会院士 ,一人被聘为皇家工程院院士 ,还有不少教授被聘为英国大学的副校长、系主任、科研中心主任等 ,其成就已经“让英国人刮目相看”。据英国的统计 ,在英国的外籍科研人员中中国人最多 ,而在大学的外籍教学人员中 ,中国教师的数量也居第四位。^[7]

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的常卫宁 (音)副教授 ,把最近分布全球的中国移民称为“灵活、成功、适应力强”的一群人 ,这些特点让他们与二战前离开中国的移民有所不同 ,后者经常不得不被动适应外国的环境。常教授说 ,新移民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背景感到骄傲。因此 ,新移民带来了一种未掺杂殖民主义的文化。许多新移民还精通信息技术 ,因而他们有许多专业技能教给新加坡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李冠健 (音)副教授也说 ,新的中国移民很有自信 ,他们在世界各地流动 ,但与自己的根紧密相连。^[8]

第二 ,全球化进程促使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 ,舒缓了居住国对华侨和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压力。过去 ,许多国家都要求移民完全接受居住国的文化 ,现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侨民的多元文化性质。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资源、环境 and 安全等方面提出的挑战是全球性的 ,促使人们认识并且不断构建人类共同的利益和文化的普遍主义成分。

众所周知 ,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的统一 ,往往要求公民在文化上的一致 :统一的语言、民族节日、历史想象、服饰样式 ,等等。正如霍耐特所说 :“只有当社会一体化从社会成员那里得到文化习惯的支持 ,而文化习惯又与他们互相交往的方式紧密相关 ,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才能取得成功。”^[9]民族国家要求文化统一 ,这就给作为移民群体的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形成压力。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必然受到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压力 ,经历身心的分裂和撕扯。譬如 ,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 ,华人不能过春节 ,不能讲华语 ,忍受了许多文化迫害。

即使许多西方国家,过去也往往要求语言上的一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多元文化和语言才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承认。认同就是与他者的区分。艾森斯塔特指出:“边界的建构既包含着积极的可能性,又包含着破坏的可能性。……这种矛盾的情结造成了暴力和侵略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他人的排斥,把他人当作矛盾情结的焦点或目标:他人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邪恶的。”^{[10] 38} 同样,“人们不断从反思的层面上对近代集体边界的建构、对集体认同的建构提出质疑。集体认同和边界不是给定的,也并非由某一超越理想和权威或永久性习俗所预先决定。它们不仅构成了反思意识的焦点,而且构成了冲突和斗争的焦点,经常由于与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的关联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10] 72} 在谈到欧洲历史时,法国社会学家列维那斯认为:“我们与他者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带有暴力结构的烙印”,这是欧洲精神的失误所在。整个欧洲历史都基于“将他者缩减成自我”。^{[11] 60}

然而,事实上,对于人类而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文化认同,毫无例外地都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列维-斯特劳指出:“所有的文化都是多元的,没有一个文化不是从历史进程中发展的混合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例如,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的历史中,“多次的混合产生了促进和丰富的作用”。^{[11] 57} 实际上,单一的认同叙述形式只是神话,以便使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透过这种神话叙述的外观,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复杂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生成的过程。不同的认同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自我认同形成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认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且赋予不同的文化本性。艾森斯塔特认为:“正因为原生成分在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市民成分和普遍主义成分交织在一起,现代野蛮主义的内核及其固有的排他主义倾向才被减至最低限度”。^{[10] 75} 实际上,全球化加强了普遍主义成分,国际贸易磨平了过度僵硬的差异文化的棱角,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变得相对容易了。

美国学者塞缪尔·施弗勒(Samuel Scheffler)指出:“人们常说,移民提供了民族认同的线索。一个经历大规模移民流的国家会发现它更不容易维持被他们奉为神圣的那些民族传统和实践形式。

一个国家统一体的表达和持续,既通过其公民所共享的历史感,也通过他们共同认可的民族节日、象征、神话和庆典,也通过他们忠诚于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还通过他们所践行的实质上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系列非正式的风俗和旨趣,其中包括服饰模式、思维习惯、音乐、幽默和娱乐风格、劳作和休闲方式、对性和性生活的态度,还有饮食口味。移民将这些文化统一的资源置于竞争和冲突的场地。移民来时带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和传统、风俗和价值观、习惯和节日。那些界定东道国的特殊认同的状态和活动——给予非移民公民属于单一民族的归属感的真实的状态——对于移民而言,好的说是陌生的,坏处说是异在的或压迫性的。”^[12] 面对这种情况,东道国可以拒绝新来者的文化和传统,强制他们改变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以便保持单一的文化传统;东道国也可以部分地接受新来的文化,采取多元文化的策略,使各种文化平行存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以上两种方法,根据不同的情况交替使用,既有多元的外观,又尽量实现文化整合。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间的人员流动成为常态,文化的多样性在不同的国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事实上,越是经济发达或发展顺利的国家,人员的流动和文化的多样性程度就越高。因此,为了自身经济和社会的稳健发展,制定适当的移民和文化多样性政策就成为所有负责任的执政者必须思考的问题。由此,布赖恩·埃文斯认为:“21世纪将告诉人们移民政策是如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去应对文明的碰撞而无须发生诸如暴力、种族灭绝和文化霸权事件”。很显然,保持文化的宽容,对于经济活动的顺畅是有利的。正因如此,“‘全球化’成了人们不断颂扬的信条,伴随它的是自由贸易、民主和人权的呼声,它们将影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4]

埃文斯指出:“最近的移民潮中,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不同民族的真正的文化传统’?是那些二战前离开其祖国的祖父母或曾祖父们持有的文化传统还是那些冷战后来的移民所熟悉的民族文化传统?……虽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移民潮中有农民、工人和非熟练的技术工人,但二战后的移民政策日益倾向于受过良好教育和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因为这样的新移民能够在新的国家中被激励着去取得成功,而不是背上文化遗

产的包袱而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渗透全球各地的美国式大众文化使各种文化的年轻人着迷,电子视频会议、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英语的主导地位等等这一切已使民族差异越来越小。当然民族差异肯定存在,但它已不是被视作获得成功和取得进步的障碍。^[6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和世界舞台的作用越来越大,参与的国际事务越来越多。这些也为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全球化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背景和前提。中国可以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国家的崛起,而不必走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一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依靠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可以获取经济利益,实现自己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旧的强权也很难组织起围堵新崛起力量的同盟。经济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游戏,而是相对利益。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所以因围堵而引起对方的危害往往也会波及自己。在涉及全球性的问题时,西方国家不得不与中国对话。由此,华侨华人在祖国的崛起中也获得相应的尊重。

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间的和谐对话过程中,华侨华人做了很大贡献。中国文化的宽容和灵活,对华侨和华人构建与居住地人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法国总统在讲到华人成功融入法国社会时指出:“华人成功融入的奥秘也许可以从中国哲学的智慧中找到根源。中国哲学价值的核心就是中庸。中庸之道恰恰可以消弭歧见,调和极端,使对立各方生活在一个和谐的集体里。”^[65]为什么中国人很好地抓住了这次全球化进程的机遇呢?显然,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的理念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功能。

第三,全球化进程正在强化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和中国之间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交流的桥梁的作用,因此多重文化认同和双重归属感变得越来越成为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常态。过去,华侨华人不是落地生根,就是盼望落叶归根;现在,他们却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游弋,成为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天然纽带。因此,从过去的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到现在许多人自由地游走在二者之间,海外华侨华人将“侨”变成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桥”。

现在的全球化促成了华侨华人的文化漂移现象。根据韩国《朝鲜日报》网站2007年11月27-29日报道,中国的“新华侨精英”正在韩开辟新天地。“新华侨”是指1992年韩中建交后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与已在韩国扎根逾百年的来自台湾的“旧华侨”概念不同。“新华侨”正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大自己的影响。新旧华侨在各方面都有差异。如果说旧华侨通过结婚、入籍等表现出了打算在韩国永久生活的态度,那么中国大陆的新华侨则有着“长期滞留”的倾向。旧华侨与本国的联系基本断绝,但新华侨却在两地同时构筑基础。在活动领域上,旧华侨一般从事餐饮业或小规模贸易业,但新华侨却凭借高学历和专业把活动领域扩展到了律师、研究岗位等专业领域及中小企业经营等领域。“旧华侨与自己祖国的联系网处于断绝状态,新华侨则维持了与国内的关系网,同时在韩国也有巩固的根基,实施的是多根基战略”。^[14]

日本《朝日新闻》2007年9月28日发表了“新华侨”在崛起的文章。文章认为,被称作“新华侨”的中国人正在日渐增多。所谓新华侨,是指那些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来到海外的中国人。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的数量20年间增长了3倍以上,在2006年已经达到56万人。与以往那些扎根于一地的华侨不同,这些新华侨赖以生存的资本是自己的知识和想法,有时候他们施展拳脚的竞技场就在中国本土。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背景下,新华侨的身影出现在各个商业领域。新华侨的优势在于他们熟悉中日两国的经济、政治差异,而且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股票上市、企业并购等各个领域都活跃着新华侨的身影。由于他们熟悉中国的情况,可以尽量减少对华贸易中的摩擦。日本人发现,只要通过新华侨,与中国的经济贸易过程就会方便许多。因此,雇佣中国人的日本企业正在逐渐增加。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山本信人在《论座》2007年7月号发表题为《全球型民族主义时代》的文章,认为“严格说来,由于近年来构成民族主义本质的全球性要素骤然凸显,使我们得以观察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现在的世界是‘全球型民族主义’的时代”。“这里所说的全球型民族主义,一是指这种民族主义与全球性问题相关

并因全球化而产生 ;二是指这种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密不可分”。21 世纪的全球型民族主义有三种表现形式 :环境问题、人口问题 ;“ 便携式民族主义”。“ 便携式民族主义”是指这样的现象 :“ 卫星电视与互联网的普及 ,使得移民融入当地社会面临着新的障碍。通过卫星电视 ,移民可以观看自己国家的节目 ,通过互联网 ,可以阅读自己国家的新闻。当地的广播电台也有面向移民、用他们的母语制作的节目。”在这种情况下 ,近年来 ,移民不再选择融入当地社会 ,而是在当地社会建立一个移民社会。“ 移民的意识大多还停留在祖国 ,对祖国发生的事情十分关心。而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国家 ,不仅遭到冷遇还要面对一些结构性问题 ,对当地社会积蓄了许多的不满。”现在是一个民族主义活跃的时代。”另外 ,在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以及汶川大地震的募集活动中 ,还出现了全球华人的“ 网络民族主义”。显然 ,通讯技术已经对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旅居美国的郑嘉仪说 :“ 我们都是美国人 ,但都有中国血统 ,所以成为两国联系的桥梁对我们而言是很有意义的。”^[15]许多华侨华人认识到 ,侨居在异国他乡做生意 ,就要了解当地的文化、知道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 ,才能生产出符合他们口味的产品 ,才能成为他们的生意伙伴。

许多华侨华人因为具有两种文化的渊源 ,从而获得发展的优势。譬如 ,爱丽斯·刘欣是 7 岁时到英国的 ,因为父母在她 4 岁时离开中国到英国 ,她在北京由祖父母照顾。2007 年 9 月 27 日《卫报》发表她的文章《红色的根》 :“ 爷爷奶奶曾灌输给我许多中国传统优良品质。尽管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有时可能在我身上占上风 ,但直到如今 ,我都从未丢弃这些优良品质。”在离开中国很长时间后 ,红色的根依然支持着我 ,伴我成长。爷爷奶奶的奋斗经历使我在英国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已在我身上扎根。”父母自我牺牲远渡重洋带给我的也是无价之宝——双重文化两种语言。既会讲汉语普通话又能讲英语成为我最大的运气。最起码 ,这使我便于找工作 ,使我成为今天的我 :一个了解两种文化财富、热爱两种文化的人。”在中国与世界日益扩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 ,华侨华人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四 ,全球化进程使华侨华人成为向世界展

示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提高了华侨华人文化自信心。过去 ,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感情更多地是基于祖国的积贫积弱而盼望中华民族的复兴 ,现在 ,对祖国的感情更多来自对祖国蒸蒸日上、繁荣发展的自豪感。对祖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华侨华人的一种期待 ,而且已经是他们的一种现实感受。由于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强 ,许多华侨华人感到与先辈的祖国更亲近了。可以说 ,华侨华人大多都情系桑梓、心怀故土、恋祖爱乡。这正如杜甫诗句所表达的 :“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华侨华人身在异国他乡 ,却心系中国文化。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深 ,原本属于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 ,也可能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进程 ;反过来 ,世界各个角落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进程。因此 ,一个国家纯粹的內政越来越少 ,而相互关联的事务却越来越多。然而 ,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权力的载体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不能完全消解国家的力量。约瑟夫·奈认为 :“ 信息革命、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不会取代民族国家 ,但会让世界政治的行为体和所有问题变得更为复杂。”^[3]¹⁸⁷英国学者鲍伯·杰索普也指出 :“ 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 ,民族国家仍然重要 ,它不是正在消亡 ,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16]实际上 ,在重构世界秩序和全球图景过程中 ,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开始稳步增长。

中国的迅速发展 ,打破了西方人的有色眼睛和狭隘的世界文明图景。布赖恩·埃文斯指出 ,“ 欧洲人认为中国文明是颓废和衰败的文明。”^[6]但是 ,现在越来越清楚的迹象表明 ,中国文化不仅获得了有生命力的复兴 ,并且有迹象将成为未来能够平衡和制约西方霸权的大国。过去 ,华侨华人往往是为了逃避战乱、灾荒而背井离乡迁居海外的 ,现在 ,他们可以分享祖国强盛带来的利益。

有学者也指出 :“ 虽然西方的科技和经济现代化将继续对中国产生影响 ,但华人世界将在数量和性质上对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村产生极大影响。”华人世界不仅包括中国大陆的 22 个省份、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台湾以及高度中国化的新加坡 ,还包括散居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 中国区域’不只是为

了从‘平的世界’获益而构建的一个跨越国界的区域,也是全球化的加速器。”认真地与中国接触就是要接受中国化的可能性。”中国“已经在重塑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是能够将大家整合在一起的因素,如果事实证明在这个受到东西方文明紧张关系威胁的世界上,中国是一个实验室,各种文化可以通过相互交流而受益,那么大家应该高兴地看到中国成为21世纪新的世界规则的缔造者之一”。^[17]显然,不仅中国在经历全球化,而且全球也在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

香港《亚洲时报》11月6日发表题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世纪》文章,指出:“中国的开放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世界中国化。……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适应能力。它能在不迷失自己的情况下进行改变,这甚至可以定义为一种非凡的复兴能力。……事实上,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领土意义上的政治实体,而且也成为触角伸向全世界的文化现象。中国化也是一个全球化的加速器。”当然,我们不要刻意展示我们的影响力,而要表现出我们和平发展的诚意。这种软实力的增长,更能激发华侨华人文化归属感,更能使他们愿意且能够顺利地表现和展示自己的文化认同。

数千年的积淀赋予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即使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也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和延续着中华文化的元素,并且给自己的居住地打上深深的中国烙印。“文化,只有文化,才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和民族之根。即只有从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歌曲、舞蹈、衣饰、食物、习俗等点点滴滴文化要素中,才能追寻到真正属于自己本民族的精神之根,才能燃起那一盏照亮自己人生之途的明灯”。^[18]虽然华侨华人生活在异国他乡,然而他们仍然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本质的载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崛起,华侨华人越来越对中华文明感到自豪,唐人街不再只是华侨华人的侨居场所,而且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他们还以积极的姿态向其他民族敞开中国文化之门,许多还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中心。不仅如此。在所有地方的唐人街,都会有一种令人兴趣盎然的气氛。唐人街既吸引人,又热情好客。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公使衔参赞舒晓认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2003年纽约率先把春

节定为法定节日。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经济非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对中国钦佩不已,对产生这一经济奇迹的文化充满好奇和向往。如果说老一代华人大都从事体力劳动,餐馆、洗衣店、杂货店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方式,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和边缘,那么新生代华人在经济、科技、艺术等领域的杰出表现正在颠覆着美国人眼中的华人形象。随着华人经济、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参政意识和权利观念正在逐渐苏醒。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刘全生教授认为,美国文化讲究进取、创造,充满动感,中国文化讲究柔韧与和谐,充满静态美,两种文化就像太极中的阴阳一样,具有互补性。中国文化中许多具有现代意义和全球价值的成分,如兼容并包,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与文化冲突论形成鲜明对照。^[19]

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华侨华人也越来越把经济贸易活动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譬如,2007年在日本举办的第九届华商大会上展现中华民族文化魅力的一系列活动,就使大会显得丰富多彩,起到了提高会议品位和改善华人形象的作用。2007年日本中华年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长蒋晓松说:“另外,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在表现华人经济实力的同时,还可以对外表现中华民族的软实力,通过展现软实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地位,改善华人形象,对华商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有所帮助”。^[20]

伴随着中国制造的产品运往全球各个角落,华侨华人变得更加自信地展示中华文化。“今天在海外各地,中文学校纷纷扩招,华文媒体读者群扩大,中国习俗、道德与观念广泛流传,带中华字头的餐饮、剧团、武术、书画、工艺、诊所、影视、书籍与学术研究盛行……构成了华人社会不离不弃的精神家园,为天下华人的繁衍、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文化滋养”。^[21]另外,华侨华人办的中文传媒不断出现,也是华侨华人文化自信和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华文媒体的最大功能是:提供华侨当地资讯、国内新闻与抒发乡情,较用心的媒体则提供适应当地规范的生活小百科,帮助华侨华人更好地在不同文化间自由穿梭。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海外侨胞是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加强对外友好交往的重要促进力量。正如胡锦涛在会见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时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华侨华人身居海外、情系桑梓,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韩震.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问题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2007(3):85-90.
- [2] 约翰·吕森.怎样克服种族中心主义——21世纪历史学对承认的文化的探讨[J].山东社会科学,2007(11):38-43.
- [3] 约翰·瑟夫·奈.硬实力与软实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4.
- [4] 布赖恩·埃文斯.移民:文明交流、融合和征服的工具[J].山东社会科学,2007(12):32-36.
- [5] 何剑.美国华人女性现状[J].世界华人,2007(4):15-17.
- [6] 马小宁,谷棣.美国有50位华裔市长[N].环球时报,2008-02-04(02).
- [7] 李鹏.中国驻英大使傅莹称在英中国教授让人刮目相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2-19(04).
- [8] 李冠健.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很自信[N].参考消息,2007-11-06(16).

- [9] 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4.
- [10]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6.
- [11] 布罗伊尔.法意哲学家圆桌[M].华夏出版社,2003.
- [12] Samuel Scheffler. Immigr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J].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35, No. 2, Spring 2007:93-94.
- [13] 评论员.想起海外华人 我们百感交集[N].环球时报,2008-02-04(04).
- [14] 韩国《朝鲜周刊》报道:新华侨成韩国新的精英族[N].环球时报,2007-11-20(05).
- [15] 高颖,马丹.在美华裔不应再沉默[N].环球时报,2007-12-21(08).
- [16] 鲍伯·杰索普.重构国家、重新引导国家权力[J].何子英译.求是学刊,2007(4):28-32.
- [17] 高大伟.21世纪,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世纪[N].参考消息,2007-11-07(01).
- [18] 石川人.文化是心中一盏明灯[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2-14(04).
- [19] 马小宁.美国:中国文化元素无处不在[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2-21(02).
- [20] 阿德功,向剑帼,蒋晓松.“和合共赢”惠及世界[N].参考消息,2007-09-18(15).
- [21] 连锦添.海外同胞:如何留住“文化之根”[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2-15(05).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HAN Zhe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changed the living state of overseas Chinese, exerting new influence upon their identity of being and bringing about fresh characteristics to their identity attachment and thei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past, Chinese emigrated mostly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the wartime chaos, famine or political persecution; now, their emigration is often on account of normal financial and trade activities. Many countries used to take measures to acculturate the overseas Chinese while most of the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diverse culture they have brought there. Overseas Chinese used to have only two choices: one is to live overseas to their death and the other is to come back to their native land in their late years. However, they are coming to and fro bridging two different cultures. The aff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owards the motherland was mostly embodied in their expectation of the revival of China, whereas their attachment more originates from their pride of the motherland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globalizati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 云)